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戴翔

(安徽财经大学 国贸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和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利用1997—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和外贸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提倡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应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更应注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10-0081-11

一、引言

对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理论所热衷且备受争议的话题。实际上,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实际情况就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将随之调整,产业重心将逐渐由有形货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产品的生产。这一判断和预测背后的逻辑思想是:工业化并非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唯一路径,服务经济同样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实际上已经证实了威廉·配第的判断和预测。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0)的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了70%,服务经济的发展因此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服务业局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结构正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联合国贸发会议

收稿日期:2011-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10YJC790039)

作者简介:戴翔(1980—),男,安徽长丰人,安徽财经大学国贸学院讲师。

(UNCTAD, 2011)的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为3 132.63亿美元,1996年突破10 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 032.76亿美元,2010年进一步攀升到25 358.91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也从1980年的712.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11 096.64亿美元。1980—2010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22%和9.59%。在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发展状况已日益成为衡量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出口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力图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

二、文献回顾

综观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理论方面略显薄弱,大多研究侧重于经验分析。在极少数的理论研究文献中,Robinson等(2002)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为了简化分析,Robinson等(2002)未考虑服务贸易模式的差异,并且仅仅将服务当作一般的商品,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理论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之后,Markusen和Rutherford(2004)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俄罗斯“入世”效应进行预评估时也指出,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而降低服务业FDI的市场准入壁垒有助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显然有助于一国福利水平的提升。相对于理论分析而言,对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则颇为丰富。Lewis等(2003)利用截面数据,选取10个国家和地区及11个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于直接导致世界服务产品的生产增加,而且还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性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Hoekman等(2006)以印度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甚至认为,服务贸易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Bosworth等(2007)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得益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得益于其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危旭芳和郑志国(2004)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与GDP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曹吉云(2007)及韩振国和刘玲利(2009)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Fixler和Siegel(2004)经验分析了一些特定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及其经济推动作用。Mattoo等(2008)对金融和通讯服务市场开放效应进行经验研究后指出,金融和通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类似的研究还有Blinder(2006)、Weiss(2010)等,他们分别对特定部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

综上所述,针对服务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验分析,很多学者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要么在国家或区域的层面从总体上考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要么从特定部门的层面实证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内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而 Hausmann 等(2007)对制成品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指出,对于将目标“锁定”在获取更高技术含量商品出口能力提升的国家会从贸易中获取更多利益,并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因此,在我们看来,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来自于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和产出扩大,还可能来自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内涵的变化。实际上,在越来越多的“服务产品”变得可贸易的同时,得益于生产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服务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拓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不仅推动了服务部门专业化生产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对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 Deardorff(2001)的研究指出,国际生产分割的快速发展,不仅进一步挖掘了比较优势,同时“价值链”的延长和不断分解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服务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也给各国出口产品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机遇。正是受到 Hausmann 等(2007)研究的启发,以及考虑到与全球服务贸易总量规模快速增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迁和服务产品全球价值链拓展,本文试图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内涵的角度,对服务贸易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三、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一)测算方法

本文借鉴 Hausmann 等(2005)测度一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一步先测度服务贸易出口分项中某一项服务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TSI),其计算公式如下:

$$TSI_k = \sum_j \frac{x_{jk}/X_j}{\sum_j (x_{jk}/X_j)} Y_j \quad (1)$$

其中, TSI_k 为服务产品 k 的技术复杂度指数, x_{jk} 是国家 j 的服务产品 k 的出口额, X_j 是国家 j 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Y_j 为国家 j 的人均收入水平(通常以实际人均 GDP 表示)。在第一步计算出服务贸易出口分项中某一项服务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后,第二步再通过以下公式计算一国服务贸易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ES):

$$ES = \sum_k \frac{x_k}{X} TSI_k \quad (2)$$

其中,ES 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x_k 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分项中服务产品 k 的出口贸易额, X 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TSI_k 为服务产品 k

的技术复杂度指数。按此方法,在数据可得性前提下,我们可以测度任一年份任一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采用动态方法,即 TSI 值采取的是各年度测算出来的实际值而非样本区间的均值。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服务贸易分类出口数据的统计不像货物贸易那样“细致”,较“宏观”分类层面上的统计数据很难如实反映一国在某一类别服务贸易项下的“亚结构”演进,在服务产品全球价值链不断拓展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而这种“亚结构”的演进恰恰通过 TSI 值的变动加以体现。概言之,采用动态方法计算,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可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从低 TSI 值的分项服务产品向高 TSI 值的分项服务产品转变;二是每一分项服务产品自身 TSI 值的增加(体现的是“宏观”分类层面下所隐含的出口“亚结构”转变)。

(二)数据来源与测算结果

按照上述设定的测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所要使用到的数据主要包括全球各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人均 GDP。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给出了 200 多个国家 1980—2009 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包括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的细分统计数据。^①但是由于部分国家在上述区间部分年份的报告数据缺失,在考虑数据可获性及确保数据连续性的情况下,本文最终选定测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年份样本区间为 1997—2009 年,选定的样本国家(地区)共 36 个。^②从上述选定的整个样本区间来看,本文所选取的 36 个国家(地区)的年度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 89.35%,因此,这 36 个国家(地区)在整个样本期间一直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能够基本满足我们的研究需要。样本国家(地区)的实际人均 GDP 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

本文首先计算出了 1997—2009 年全球服务贸易各出口分项的 TSI 值,如表 1 所示。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服务贸易中每一出口分项的 TSI 值都大致呈现出逐步增大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地,如果我们按照惯常方式将表中各服务贸易出口分项划分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主要包括旅游、运输和建筑服务)和现代新型服务贸易部门(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不难发现现代新型服务贸易部门各年度 TSI 值的变化趋势较传统服务贸易部门更快更明显。这也说明了现代新型服务贸易部门较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而言,在技术内涵方面可能有着更大的进步空间和发展潜力。

根据上述计算出来的 1997—2009 年各年度 TSI 值,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地区)在样本区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了 1997—2009 年部分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

表 1 1997—2009 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分项 TSI 值

年份	运输	旅游	通讯服务	建筑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专利和特许费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1997	700 012	588 880	787 844	643 128	773 081	1 000 911	892 696	413 657	654 683
1998	691 141	568 989	715 926	538 836	846 711	1 025 941	1 071 548	418 397	615 987
1999	697 370	576 062	739 380	578 603	805 522	1 057 530	1 002 231	457 817	615 225
2000	680 270	537 751	724 173	623 937	814 324	992 874	874 485	461 182	640 971
2001	672 637	536 266	693 812	584 328	746 930	964 655	783 790	449 451	640 175
2002	711 442	589 322	731 931	592 152	780 517	1 023 303	801 062	477 484	683 451
2003	827 865	709 897	818 726	702 877	949 749	1 191 889	885 456	553 868	790 508
2004	924 050	804 905	927 802	824 515	1 116 257	1 294 184	1 023 119	653 420	908 115
2005	986 037	838 012	1 058 986	1 004 259	1 273 452	1 372 136	1 167 540	698 593	964 624
2006	1 057 624	931 218	1 032 913	812 841	1 270 271	1 376 884	1 086 063	735 589	1 057 475
2007	1 197 754	1 070 837	1 208 546	893 031	1 331 960	1 495 873	1 159 574	808 126	1 224 191
2008	1 278 562	1 166 780	1 320 348	976 267	1 453 822	1 641 616	1 358 055	843 488	1 323 406
2009	1 151 948	1 062 695	1 177 064	930 960	1 257 737	1 469 751	1 235 466	779 084	1 205 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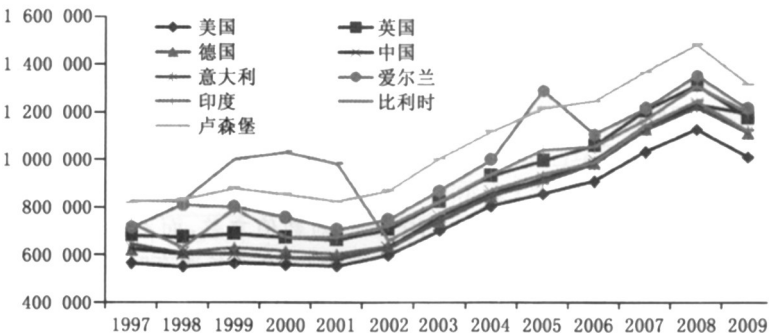


图 1 部分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情况(1997—2009 年)

图 1 显示,虽然部分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基本上都呈现出大体上升的变化趋势。显然,这种增长趋势既可能来自于一国出口结构从 TSI 值较低的服务产品向 TSI 值较高的服务产品转变,也可能来自于“宏观”分类层面上统计数据所没有体现出来的“亚结构”转型升级。当然,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二者关系进行进一步计量检验之前,我们绘制了样本国家(地区)在样本区间内实际人均 GDP 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两者皆取自然对数形式)的散点图,以初步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结果显示,二者大体呈正相关关系。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不言而喻,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然而,当将经济增长变量作为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时,自变量的选取通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 Durlauf 等(2005)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时指出,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有多达 40 余种并并不完全相同的理论解释,对解释变量的选取累计高达 100 多种。为此,本文借鉴 Barro(1991)

的做法,即与经济绩效密切相关且能基本上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解释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外向国际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因此,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外向国际化程度和基础设施。据此,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DP_{i,t} - GDP_{i,t-1} = \alpha GDP_{i,t-1} + \beta ES_{i,t-1} + \gamma R_{i,t} + \mu_t + \nu_i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i 表示国家(地区), t 表示年份,GDP 为实际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值。这里解释变量用本期和上一期人均 GDP 对数值之差,而不是直接对实际 GDP 增长率取自然对数,主要原因在于实际 GDP 增长率有时可能为负数而无法取对数。ES 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自然对数, R 为上述所述决定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此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方程中, μ 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 ν 为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变量, ϵ 为误差项。在上述计量模型中,本文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设定为滞后一期,即上一期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本期人均 GDP 有影响;与此同时,上一期的人均 GDP 水平往往对本期人均 GDP 有滞后影响,因此,滞后一期的人均实际 GDP 也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中。除此之外,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采用当期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实际人均 GDP 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S),采用的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计算出来的样本国家(地区)的数据;由于目前并无各国(地区)人力资本指数(HR)的直接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 Barro 和 Lee(2010)最新研究得出的各国(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对于物质资本(Physical)的度量,本文采用现有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即采用固定投资与 GDP 之比作为物质资本的替代变量,其中固定投资额数据亦来自于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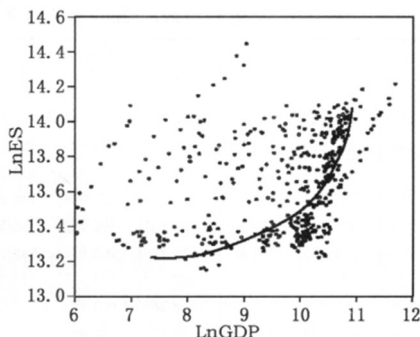


图 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与实际人均 GDP 散点图

外向国际化程度的度量,本文采用一国(地区)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即出口贸易额与当年 GDP 之比,用 EX 表示)和外资依存度(即当年引进 FDI 与 GDP 之比,用 FDI 表示),其中各国(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和引进 FDI 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对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据的选取,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地区)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中的基础设施指数(Infrastructure Index)。

(三)回归结果

本文在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时,所使用的样本国家(地区)为 36 个,但是在上述 36 个国家(地区)中,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匈牙利的物质资本变量在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中缺失,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将上述 4 个样本剔除,样本区间设定为 1997—2009 年,采用面板数据对上述计量方程进行回归。考虑到本文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研究,对上述模型的估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实际人均 GDP 增长($GDP_{i,t}-GDP_{i,t-1}$)						
	(1)	(2)	(3)	(4)	(5)	(6)	(7)
ES(滞后一期)	0.049*** (0.01)	0.041*** (0.01)	0.039*** (0.01)	0.040*** (0.01)	0.039*** (0.01)	0.040*** (0.01)	0.042*** (0.01)
GDP(滞后一期)	—	-0.028*** (0.01)	-0.029*** (0.01)	-0.029*** (0.01)	-0.029*** (0.01)	-0.028*** (0.01)	-0.026*** (0.01)
HR	—	—	0.051** (0.05)	0.051* (0.08)	0.048* (0.08)	0.049* (0.06)	0.046* (0.08)
Physical	—	—	—	0.021** (0.04)	0.020** (0.05)	0.021** (0.04)	0.020** (0.05)
EX	—	—	—	—	0.036*** (0.03)	0.031** (0.03)	0.030** (0.03)
FDI	—	—	—	—	—	0.027** (0.02)	0.025** (0.02)
Infrastructure	—	—	—	—	—	—	0.018** (0.03)
常数 C	-0.22*** (0.01)	-0.18*** (0.01)	-0.21*** (0.01)	-0.17*** (0.01)	-0.25*** (0.01)	-0.23*** (0.01)	-0.22*** (0.01)
判决系数 R ²	0.679045	0.652831	0.695352	0.611986	0.665472	0.693129	0.672568
样本观测数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注:在所有的估计中都包括时期固定效应和截面固定效应,受篇幅所限,表中仅仅给出了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相伴概率,*、**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表 3 同。

在表 2 中,第一列是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换言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到第七列是在计量方程中逐步纳入实际人均 GDP 滞后一期变量、人力资本指数(HR)、物质资本(Physical)、出口贸易依存度(EX)、外资依存度

(FDI)以及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容易看出,纳入控制变量并没有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性。当然,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约束问题,即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实际 GDP 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上述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图 2 的结果大致显示实际人均 GDP 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从现有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实际人均 GDP 与其增长率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因此在采用广义矩(GMM)方法进行估计时,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实际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GMM 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实际人均 GDP 增长($GDP_{i,t}-GDP_{i,t-1}$)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ES(滞后一期)	0.036*** (0.01)	0.035*** (0.01)	0.038*** (0.01)	0.038*** (0.01)	0.039*** (0.01)	0.035*** (0.01)	0.035*** (0.01)
GDP(滞后一期)	—	0.0019* (0.08)	0.0021* (0.09)	0.0016* (0.09)	0.002 (0.15)	0.0013* (0.09)	0.0015* (0.08)
HR	—	—	0.038** (0.04)	0.029* (0.07)	0.025* (0.08)	0.035* (0.06)	0.028* (0.09)
Physical	—	—	—	0.023* (0.06)	0.018** (0.06)	0.015** (0.05)	0.016** (0.04)
EX	—	—	—	—	0.024** (0.05)	0.021** (0.04)	0.022* (0.06)
FDI	—	—	—	—	—	0.0058* (0.06)	0.0052* (0.05)
Infrastructure	—	—	—	—	—	—	0.013** (0.02)
常数 C	-0.35*** (0.01)	-0.41*** (0.01)	-0.39*** (0.01)	-0.44*** (0.01)	-0.38*** (0.01)	-0.40*** (0.01)	-0.42*** (0.01)
样本观测数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与表 2 估计结果类似,在表 3 中,第一列是仅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他各列是依次纳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换言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构建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然后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模型中纳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后,二者表现出来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成立。这一研究结论与 Hausmann 等(2007)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时所得结论基本一致。这一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除了大力发展制成品出口贸易并提升制成品出

口技术复杂度之外,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同样能够促进一国(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且可行的路径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以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面临一系列现实约束,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地,在世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日益成为衡量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的大背景下,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内涵的角度,探寻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却成了我们的“小舢板”。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紧迫性,以及服务贸易作为转变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似乎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共识。诚然,服务贸易的发展的确可以起到协调、优化中国贸易结构等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服务贸易本身也存在着增长方式问题,不同的服务产品同样具有技术内涵的差异性,忽视了这一点,“重量不重质”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同样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可能性。而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服务贸易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来自于“量”的扩张,“质”的提升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大力呼吁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这样才能更好地有助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此,我们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 由于决定服务贸易技术内涵变化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力资本,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姿态和思路加强服务贸易领域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通过加强教育和培训等培养高端人力资本,在开放条件下特别是要素可跨国流动的条件下,还应通过扩大开放领域、完善服务市场机制以及采取优惠政策等吸引服务经济领域“外智”流入。

2. 基础设施、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发展、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的支持等也是决定具有较高技术内涵的现代新型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要注重这些关键要素的培育和积累。

3. 应当看到,本轮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引擎的服务外包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归核化”发展战略下必然得到更快发展,更多和更高级的生产环节、工序以及服务流程等将“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当然,如何在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增长的同时

不断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探讨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注释:

- ①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中对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的分类是按照 IMF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方法进行的,主要包括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 11 类。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服务,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剔除了政府服务,此外,其他商业服务因分类太泛,也被剔除,从而采取了余下 9 类分项。
- ②这 36 个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荷兰、印度、中国香港、比利时、新加坡、瑞士、瑞典、卢森堡、加拿大、韩国、奥地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土耳其、中国台湾、泰国、波兰、马来西亚、巴西、芬兰、葡萄牙、以色列、埃及、捷克和匈牙利。

参考文献:

- [1]危旭芳,郑志国.服务贸易对我国 GDP 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04,(3):75—79.
- [2]曹吉云.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探讨[J].国际商务,2007,(4):62—66.
- [3]韩振国,王玲利.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 1985—2006 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3):78—84.
- [4]Hoekman B, Mattoo A. Services trade and growth[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461, 2008.
- [5]Blinder Alan. Offshor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J]. Foreign Affairs, 2006, 85(2):113—128.
- [6]Bosworth, B, Collins S M, Virmani A.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Indian economy[R]. NBER Paper No. 12901, 2007.
- [7]Deardorff A V. International provision of trade services, trade, and fragment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9(2):233—248.
- [8]Fixler D, Siegel D.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9, 10(2):177—194.
- [9]Hoekman B, Mattoo A. Servi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oha Round: Exploit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WTO[R]. CEPR Discussion Paper 5682, 2006.
- [10]Lewis J D, Robinson S, Thierfelder K.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SADC economies [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3, 12(2):156—206.
- [11]Hausmann R, Huang Y,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1—25.
- [12]Robinson S, Wang Z, Martin W. Captu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J]. Economic System Research, 2002, 14(1):3—33.
- [13]Markusen J R, Rutherford T F. Learning on the quick and cheap: Gains from trade through imported expertis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03, 2004.

[14]Weiss J. Changing trade stru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wth[J]. World Economy, 2010,33(10):1269—1279.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DAI X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measuring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on the basis of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09.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has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is, the more significant its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trade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foreign trade remains to be restructured and upgraded. Under these backgrounds, the promotion of actively developing services trade should not simply pursue the scale expansion,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crease in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s expor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foreign trade and promote the sound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services trad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export;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周一叶)